

抗战时期中国国内对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反应

雷志松

(浙江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3)

摘要: 1938年2月, 国际和平联合在英国伦敦召开世界援华制日大会, 严厉谴责日本侵华罪行, 决议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用抵制日货等手段制裁日本与援助中国。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召开前后, 国共两党对大会寄予厚望, 国内报刊对大会持续关注, 民间团体及社会各界对大会热烈响应。世界援华制日大会为中国反侵略事业以及世界反法西斯伟业奠定了一定的舆论基础与社会基础, 扩大了中国政府与社会各界对国际援助的认识, 唤醒了国际和平势力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对战后中外关系的变动也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国际和平联合; 世界援华制日大会; 舆论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8)05-0193-08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时期也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与抗战时期复杂的中外关系相对应, 人们针对它的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近年来, 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开始重新定位中国抗日战争。战时外交研究成了中外关系史研究中较为充分的一个部分^[1-3]; 有关抗战时期国际和平运动与国际援华运动的背景与演变等问题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即在国内引起关注^[4,5], 更在近年取得了丰硕成果^[6-9]。尽管研究成果丰富, 仍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如关于国际和平联合这一在当时被称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和平舆论团体”与“世界最大之人民和平团体”^[10], 其意义不可谓不重要, 但除个别著作稍有论述外, 绝大部分著作甚少涉及。对国际和平联合于1938年2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援华制日大会, 更是鲜有专题研究。本文拟在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 勾画出抗战时期中国国内的国共两党、报刊、团体、社会各界对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反应。

一、国际和平联合及其世界援华制日大会概况

和平主义是在近代西方具有广泛影响的一种社会

思潮。从晚清到民国, 部分中国人士也曾参加过西方和平主义者的一些活动。至20世纪30年代, 德意日法西斯主义抬头, 世界性战争威胁加剧, 成立于一战后的国际联盟“未臻完善”^[11]便已衰退。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逼近, 世界各国的反战和平运动逐渐高涨, 并在欧美形成空前声势^[12]。中国国内的抗日反战浪潮, 也与欧美和平运动相汇合。和平主义者使命感与国际性合作由此形成。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引起国际形势的变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 打破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在华势力的均衡态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 进一步排斥美、英、法等国的在华利益, 并削弱他国在中国及远东的地位。这就引起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中国抗战态度的变化。

在中国全民族抗战初期, 中国集中全国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 发动了反侵略的全面持久抗战, 同时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国际援助。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立即表示积极支持, 美、英、法等国也逐渐发生了从中立观望到援华制日、从道义性援华制日到象征性援华制日的转变, 这些国家的东亚政策先后经历了绥靖、绥靖与抗衡交织、抗衡的轨迹。英、美、法、苏等国的民众、国际团体与亲华团体开展了形式多样、各具特点的援助中国抗战的活动, 掀起了援助

收稿日期: 2018-01-13; 修回日期: 2018-03-11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世界援华制日大会与中国抗战”(2014M562318); 浙江科技学院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研究”(F701109H05)

作者简介: 雷志松(1973—), 男, 江西广丰人, 历史学博士, 浙江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近现代中外关系史、抗日战争史, 联系邮箱: leizhisong@163.com

中国抗战的热潮。世界舆论之绝大多数逐渐倾向于谴责日本侵略与同情中国抗战。

在这个背景之下,国际和平联合创立。国际和平联合(英文简称为 I.P.C., 法文简称为 R.U.P., 中国国内起初将之译为世界和平运动, 在其中国分会成立后将之译为国际反侵略运动)^[13], 是抗战时期以欧洲为中心开展国际性和平运动的民间团体, 其目的在于“把全世界一切反侵略的散碎的力量, 组织集中起来”, “团结世界上一切的力量, 来争取和平, 消弭战争”^[14], “制裁侵略者及援助被侵略者, 以祛除侵略回复和平”^[15]。国际和平联合积极动员其所属的社会团体和国际团体, 通过抵制日货与对日禁输军需品等办法援助中国。抗日外交呈现出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共管齐下的良好局面, 国际和平联合成为抗战时期国际上国民外交最广泛、最高度的力量集结。

国际和平联合最初的公开性活动, 是于 1936 年 9 月 3-5 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运动大会。世界和平运动大会共有 37 国派代表参加, 出席者有各国政界、学界及工农妇女代表 4 000 余人。中国方面的陈铭枢、陈友仁、陶行知、钱俊瑞、熊式一、王礼锡、胡秋原等人出席了大会, 陈铭枢为首席代表, 王礼锡为开幕日发言人。法国前总理赫礼欧、苏联职工联合会秘书长许卫尼克、美国和平大会主席塞尔、印度国大党代表梅农等世界知名人士都在大会上发言。大会闭幕之日, 决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设立“世界和平运动总会”, 选举产生了国际理事会及国际执行部, 执行部归理事会领导, 并成立了一个常务机关——国际秘书处。执行部由 16 个国家的人员组成, 中国方面的孙科及陈铭枢当选为理事^[16]。世界和平运动大会最后一致赞同并通过大会宣言, 宣言称: “各国人民, 务当以斗士的精神, 维护和平。大会兹以最诚挚之态度, 吁请各国人民参加此一伟大运动。此项运动, 并不干预他国内政。其唯一目的, 厥在全世界各民族, 无分强弱, 均在完全平等之条件下, 共享和平之乐。苟有一国焉, 违反国际法, 而从事侵略, 因而破坏世界和平, 则吾人当以唯一敌人视之。”^[17]世界和平运动大会还决定发起世界范围的抵制日货运动以援助中国。世界和平运动大会的召开是 20 世纪 30 年代影响最大的和平活动, 大会给予中国抗战以深切的同情和有力的支持, 对动员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战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对这次大会的积极参与以及大会对中国的声援, 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抗战具有国际性这一特点。

国际和平联合召开世界和平运动大会后, 即在各国建立分会组织, 部分代表奉命来到中国, 向中国当

局说明发起国际和平运动和召开国际和平运动大会的意义, 广泛联系并努力争取中国社会各界的支持。1938 年 1 月 23 日中国分会在汉口正式成立, 宋庆龄为中国分会理事会名誉主席, 宋子文为主席, 邵力子为副主席。国际和平联合召开世界和平运动大会后, 在万国博览会中设立和平馆, 还召开了世界援华制日大会、世界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各国农民代表会议等一系列会议。这些对艰难抗战的中国而言, 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抗战的意志, 也显示了国际和平势力及世界舆论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其中, 世界援华制日大会(World Conference for the Boycott of Japan and Aid to China)是国际和平联合于 1938 年 2 月 12-13 日在英国伦敦牛津街英国工业大厦(British Industrial House)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声援中国抗战的会议。21 个国家和 25 个国际团体的代表 800 余人参加了大会^[18], 李石曾、顾维钧、郭泰祺、胡适、陶行知、陈友仁、钱俊瑞、吴玉章等为中国代表。

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召开之前, 国际和平联合秘书处为大会准备了《联合援华制日说帖》, 为参会代表的讨论和大会宣言的通过提供了依据。大会说帖包括“日本侵华之事实”“日本侵华之法律观”“全世界对日本之抗议”“中国对日之抵抗”“经济制裁能否阻止日本之侵略”等内容。1938 年 2 月 12 日上午, 国际和平联合会会长致开会词; 宣读蒋介石、宋子文、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法国前财政部长赫诺等人致大会的电文; 各国代表演说, 其中中国代表演说的有李石曾的“我们的胜利也就是你们的胜利”、郭泰祺的“和平必须是硬性的东西”、顾维钧的“和平问题之枢纽捉在世界民众手里”、吴玉章的“中国抗日战争的新阶段”、王礼锡的“制止法西斯侵略, 拯救中国, 拯救世界”等。12 日下午及 13 日上午, 举行分组会议, 讨论从各方面援助中国的措施。13 日下午, 举行全体会议, 通过了大会宣言《制止日本的侵略》, 宣言交代了大会召开的缘由, 强烈谴责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 提出了“救中国, 保卫世界和平”的行动纲领, 通过了宣传组、工会组、合作组、消费者组、技术组、国会组、宗教道德组和救济组等小组委员会的决议案。13 日晚上, 各国代表继续发表演说。世界援华制日大会严厉谴责日本侵华罪行, 决议制裁日本与援助中国。在大会会场, 贴满了“Save China, Save Peace(拯救中国, 拯救和平)”和“The Peoples Can Stop the War(人民能制止战争)”等标语。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召开, 引起了中国国内的国共两党、报刊、团体、社会各界等的密切关注。

二、国共两党对大会寄予厚望

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发展和巩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在孤军对日作战中深感建立反日同盟的重要性，从民众到政府都呼吁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制止日本的侵略^[19]。在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召开前夕，德、意、日法西斯强盗在西方攫取埃塞俄比亚和侵略西班牙等，在东方侵略中国，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国际局势的变化促使国际和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援华制日的民意基础，全世界反对侵略与拥护和平的人士相继开展援华制日运动。在中国国内，国民党与共产党看到了这种变化。

在1938年2月12日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开幕之时，蒋介石迅即致电大会，电文中说：“贵会今将断然制止日本之残暴侵略，余愿代表我中国四亿五千万受战争荼毒爱好和平之民众，谨致谢忱。日本夺我东四省五十万方英里之领土，今复掠我腹地，侵及九省。日军蹂躏之所至，中国壮丁靡有孑遗，无辜妇女既遭摧残复难免其屠戮，而髫龄童子或被凶杀，或父母罹难，尽成流浪之孤儿。中国今兹之抗争，正竭其人力物力作坚韧之撑持，即最后一人，最后寸土，仍将继续此神圣之战争，任何牺牲，决不变志！诸公今日召此大会，目的欲制止日军之疯狂与残暴，此种同情之表示，足使我抵抗侵略之战争，骤增新生之力量，使世界公理之伸张，复获新生之希望。”^[20]蒋介石在军事被动、政治主动情况之下，藉电文展现了日寇残暴的事实真相，谴责日本侵华暴行，表明了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对大会的召开表示感谢并希望大会采取具体步骤“制倭援我”。蒋电体现出了中国政府利用世界援华制日大会这一国际政治舞台，争取国际社会采取援华制日的具体行动。宋子文与邵力子也联名致电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希望大会能在巩固世界和平力量、反对国际侵略、制止日寇残暴行为等方面作出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动员民众与积聚抗战力量的作用。

国民党中央作出了在1938年2月6—12日的一周时间里全国举行反侵略运动宣传周的决定，以响应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召开，要求“各地都要扩大宣传，激励反侵略和抗日的革命精神，应注意两件大事：一是促进国民外交，一是加强内部团结”^[21]。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分为宗教、文化、妇女、青年、农工、商人、儿童等宣传日。蒋介石为反侵略运动宣传周题词“为

正义人道而奋斗”；汪精卫为反侵略运动宣传周题词“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为国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战，同时为世界之正义和平而抗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国内各地响应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工作作出了部署，以训令的形式对全国各地发动民众举行拥护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并明令各省应于1938年2月9日在省会所在地发动民众举行拥护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活动。

在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召开之际，众多国民党要员与国民党地方组织纷纷响应。汪精卫发表《为伦敦大会对全世界广播演词》，冯玉祥演讲《共同铲除人类的公敌》，王宠惠演讲《为增进和平与抗战》，章伯钧演讲《由反侵略到和平之路》。陈铭枢认为中国在响应大会的过程中，应“组织并扩大中国分会组织”，“乘此时机扩大国际宣传”，“进行拥护政府抗战到底之投票反日和平铜元运动，向全世界表示我四万万五千万人均拥护和平之斗争”^[22]。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赖琨在湖南响应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致词中指出，对于世界援华制日大会一方面要表示拥护，另一方面更应增加抗战的决心。四川省政府则发出电令，决定于1938年2月13日在全川各县组织各界大会响应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召开^[23]。

抗战军兴之初，对中国持同情者主要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日本者，除了德国外，增添意大利一员。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性和持久抗战的巨大消耗，促使中国共产党把如何对待国际援助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战略问题来对待。当国际和平联合将在伦敦举行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消息传到延安时，中共中央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声援活动^[24]。1938年2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今天举行的反侵略大会，从它的意义来说，不仅是延安的，而且是全国性的，全国各地在这几天均举行同样的大会，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反对侵略战争。这个大会又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性的。在明天，伦敦将举行全世界的反侵略大会，几十国代表都参加，表示一个空前伟大的世界斗争的开始。”^[25]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是执政党，难以全面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但中国共产党作为当时中国国内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被国际社会所重视。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战时外交活动。毛泽东的演说，从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出发，提出了积极争取外援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认识。

1938年2月1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致电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电文中表

示：“虽然我们已经遭受了很大的牺牲，但我们敢请你们转告全世界爱好民主和平的政府、人民和文化工作者：我们为求中国民族的生存，为争取世界和平阵线的胜利，也为保卫被法西斯摧残的文化，我们永远不会在日本军阀的面前屈服，并且，我们相信：有我们坚决持久的抗战，国际的积极援助，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26]同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召集文化工作者及各种文化团体，在抗敌后援会召开边区文化界反侵略运动大会，响应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周扬、艾思奇、何干之、吕骥、李凡夫、董纯才等人到会。

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召开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也积极开展响应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活动。中共鄂西中心县委组织召开“宜昌各界拥护援华制日民众大会”，会场设在学院街小学，会后参会民众举行绕城游行^[27]；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积极组织成都各界反侵略大会和火炬游行，万县的反侵略运动宣传周的活动顺利开展，梁山等地则举行了“拥护世界援华制日民众大会”的集会和游行^[28]。团结抗敌的巨大能量得以迸发，气贯长虹的抗战精神在这里逐渐形成。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寄予厚望，动员全国积极响应世界援华制日大会。这些都表明了国共两党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基于对国际形势存在法西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认识，把世界援华制日大会视为一支同情与赞助中国抗战的力量，并积极争取这种同情与赞助。

三、国内报刊对大会持续关注

研究中国国内舆论对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认知，报刊是很好的研究客体。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召开引爆了中国国内的舆论媒体，《大公报》《全民抗战》《抗战三日刊》《妇女共鸣》《动员周刊》《新华日报》《群众》《新中华报》《东方画刊》等报刊纷纷发表社论、时评、消息与文章等，有些还配有图片或照片，对世界援华制日大会进行了大幅度报道。

《大公报》作为民国时期的主要报纸，重视国内时事的报道，对国际时局的动向也很敏感。抗战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而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召开是抗战时期国内外的一个重要事件，《大公报》毫不例外地对这次大会给予了关注。1938年2月12日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开幕当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呼吁：“参加大会之各国各团体代表及各名流，运用你们正义的权威，感动你们各政府及各政党，

以形成反侵略的国家阵线”^[29]；2月15日，《大公报》再次发表社评，认为中国“一方对世界大众，深表感谢，一方则促使军民同胞们，更认识世界大势与自己责任”^[30]；同日，《大公报》还发表消息称：“伦敦大会通过决议案，请政府勿供给日本军火金钱，抵制日货并举行援华运动周。”^[31]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是报纸的两种主要体裁，报道是主体，评论是灵魂，《大公报》对大会既有报道又有评论，实现了主体与灵魂的统一。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大型机关报，《新华日报》在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召开前后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对大会进行详细的追踪报道。1938年2月10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32]；2月12日，《新华日报》专门出版“全国文化界响应世界反日援华大会特刊”，内载董必武的题词、邵力子的文章《文化界一齐努力》、歌曲《为自由和平而战》等^[33]；2月13日，《新华日报》设立“国际反侵略宣传周儿童日特刊”，内载叶剑英的题词、李德全的文章《反侵略运动儿童日》、歌曲《健儿进行曲》和《反侵略宣传周儿童日告武汉小朋友书》等^[34]；2月11-16日，《新华日报》发布了许多与世界援华制日大会有关的消息，如《国际反侵略大会今日在伦敦开幕》^[35]、《国际反侵略大会八百余代表一致反日援华》^[36]、《国际反侵略大会通过援助中国决议》^[37]、《国际反侵略大会中援华抵制日货会议闭幕》^[38]等。《新华日报》对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追踪报道，起到了宣传动员民众的作用。

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29日将《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同年9月9日《新中华报》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1938年12月25日停刊。《新中华报》于1938年2月5日、10日、20日三期登载了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议题和国内外民众对大会的反应等相关内容，拥护与响应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召开，激励中国人民抗战到底。2月5日的要闻简报介绍了英美工人援助中国与世界各地抵制日货的情况^[39]；2月10日的《全国各地举行反侵略运动响应反日援华大会》^[40]，报道了全国各地响应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盛况；2月20日的《伦敦举行民众大会响应世界和平运动》^[41]，则描述了英国伦敦民众大会到会群众慷慨募捐援助中国的感人场面。

《全民抗战》《抗战三日刊》《团结周报》《战时民众》等一大批抗战刊物纷纷在重要版面对世界援华制日大会进行分析与评价。如社论或短评有《国际反侵略的力量》^[42]、《国际反侵略运动》^[43]等，专论有《我

们应该怎样加强扩大国际反侵略运动》^[44]等。《新新新闻》《浙江潮》等地方刊物和《东方画刊》等专业刊物也对大会给予了关注。《有四十国代表出席，援华大会今在英举行》^[45]、《拥护国际反侵略大会》^[46]、《国际反侵略大会的成果》^[47]等文章，介绍了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经过与大会取得的成果，对大会给予了高度评价。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和平运动是一场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的群众性运动，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又是这一时期世界和平运动的重要标志。中国国内报刊对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关注和对大会提出的期望，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国内报刊及其所从事的事业具有民主进步的性质，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成为保障二战后的世界和平事业的中坚力量积蓄了力量与奠定了舆论基础。

四、民间团体及社会各界对大会热烈响应

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及社会变动是与世界形势紧密相连的。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官方外交继续发挥作用，民间外交也日渐活跃。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了半个中国，数千万平民被屠杀，文化教育机关被摧毁殆尽。中国的抗战是一场涵盖社会各阶级与各阶层的全面抗战，在抗战时期召开的世界援华制日大会，也是一场中国抗战力量与国际和平势力的大汇合。

国际和平联合中国分会作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团体，充分利用其与国民政府的密切关系，并发挥其组织完备的优势，积极开展宣传与社会动员工作。在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召开之际，中国分会向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发去《告全世界人士书》，提出具体要求：“请求决议，各国民众团体举行‘中国周’，尽量揭露日本侵华罪状，实行抵制日货，以为我国抗战声援。”^[48]中国分会编译了介绍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内容的小册子，扩大中国国内对大会的了解及对国际援助重要性的认识。

中国文化界协会、中国回教公会、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中国劳动协会等国内团体纷纷致电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热烈响应大会的召开。如中国文化界协会在致大会的电文中说：“伦敦国际援华制日大会公鉴：贵会主持正义，倡导和平，维护现代文明，保障人类幸福，举世同钦。顷以援华制日举行大会，度更有具

体而有效之方案，使日本侵略暴行为之敛迹，不独嘉惠我国，亦所以保持世界之安宁秩序，远道闻风，曷胜钦仰。中国全国文化界一致声援外，谨此驰电致敬。尚希继续领导世界爱好和平人士，努力排斥侵略主义。”^[49]中国文化界协会等团体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同时它们又有着较为开阔的全球视野，凭借各自的优势，在响应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国内各种社会力量形成以武汉为中心的空前大团结。当时最大的几个国际反侵略和平团体如国际和平联合、国联同志会等，都以武汉为中心开展活动。武汉也是国际和平联合中国分会的所在地，是中国国内响应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中心区域。武汉各界成立了拥护援华制日运动筹备会，声援世界援华制日大会^[50]；1938年2月6日为响应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宣传周的宗教日，武汉“基督教徒在人座堂举行为国难祈祷礼，齐唱《我爱祖国》歌”^[51]；2月11日，武汉各界在市商会集会响应世界援华制日大会^[52]。武汉还成立了各界拥护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组织，发起武汉各界拥护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大游行。

湖南各界迅速行动起来响应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召开，并以“大中华民国湖南各界响应国际反侵略运动宣传大会”的名义致电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电文中说：“日本帝国主义者，挟其侵略野心，恃其优越武器，对我中华民族作残暴之进攻。破坏世界和平，蔑视国际正义。自甘戎首，举世同仇。贵会为戕暴惩凶起见，爰有反侵略大会之举行，逖听之余，莫名感奋。我中华民族，誓以最大之决心，长期之抵战。尚望贵会继续奋斗，贯彻主张，共同灭此世界之公敌，人类之蠹贼。”^[53]江西、贵州、广西、广东等地社会各界也举行各种活动响应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广东社会各界集会，“议决电请实行历届决议援华各案，并请迅速采取有效办法制止日军使用毒气，15万人示威游行”^[54]。追求世界和平与反对侵略是紧密结合的。中国国内社会各界在响应世界援华制日大会中，向国际社会揭露了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要求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湖北省委的领导下，在长江局工青妇组织以及各抗日救亡团体的具体组织与推动下，武汉各界开展了“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国际援华制日运动”等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延安的妇女

与儿童 600 余人也于 1938 年 2 月 12 日在民教馆集会^[55], 响应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召开, 起到了很好的宣传群众与动员群众的作用。

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战争, 实质是保卫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战争。对于这场战争的意义, 中国国内的进步人士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社会名流和一批投身和平运动的学者也是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支持者。宋庆龄在香港致电世界援华制日大会, 表示“吾辈之胜利亦即世界和平、自由、民主之胜利也”, 要求“利用世界之和平势力, 制裁侵略国家”^[56]。在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召开之时, 蔡元培为国际和平联合中国分会的会歌作词, 调寄《满江红》, 歌中唱道:“公理昭彰, 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 领土大小, 军容赢绌。文化同肩维护任, 武装合组抵抗术, 把野心军阀尽排除, 齐努力。我中华, 泱泱国, 爱和平, 御强敌。两年来, 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 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歌曲, 显成绩!”^[57]歌中洋溢着深厚的爱国热情, 充满了国际和平运动和反侵略战争必胜的信心。茅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援助中国的伦敦大会召开的今日, 我们中国人民为不辜负世界人民的热心援助, 为求自己的自由生存, 所必须尽的本分, 就是加强巩固全民族的团结, 上下一心一德, 抗战到底。”^[58]这些都反映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心声, 也指出了中国应该努力的方向, 希望中华民族形成全民族同仇敌忾的局面,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得到了很好的统一。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 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精神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召开, 更标志着国际援华抗日的共识逐步得以形成。在中国国内, 各种团体与社会各界对世界援华制日大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响应活动。从这些响应活动的热烈程度可以看出, 反抗侵略的中国人民在呼吁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这些响应活动也是中国国内社会动员的一次有效演习, 显示了巨大的力量, 为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同情与援助作出了贡献。

五、结语

在中国全民族抗战初期, 当西方国家政府在援华问题上摇摆、迟疑的时候, 各国际和平组织的援华运动却十分活跃。在响应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过程中, 中国国内认识到了大会“在精神方面已激励了各国人民热烈的同情, 在物质方面也获得了国际广泛的援

助”^[59], “给中国政府、前方将士、民众, 以无限的鼓励, 告诉我们, 我们的抗战已获得了全世界的同情”^[60]。中国国内还认识到了世界援华制日大会使国际和平势力制裁日本、援助中国的共识进一步扩大, 大会促进了各国援华制日运动的发展, 为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国内对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意义有着深刻认识。中国国内意识到, 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召开表明国际反侵略运动“由空言而渐趋实际, 由空泛运动而渐趋有组织有系统之积极动作”^[61]; 认为“同情于我国抗战者已经遍及全球, 这个国际间民众的助力是一种最可靠、最伟大的助力”^[62]; 大会“积极赞助各地抵制日货之运动, 该会与有力焉”^[63]。中国国内意识到, 中国需要通过世界援华制日大会这个桥梁, 把外部的支持转化为中国抗战的动力。正如抗战歌曲《国际反侵略》所唱的:“伦敦开大会, 侵略誓反对, 国际大联合, 暴日必崩溃。暴日是野兽, 世界之公仇, 先要亡我国, 而后霸全球。”^[64]中国国内在响应世界援华制日大会之时, 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力更生与外部援助的关系, 认为要在“自力更生的立场上, 来争取友邦的同情与援助”^[65]。这些体现了中国国内对国际援助与中国抗战关系的认识有了更深层次的提高。

抗战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随着战争的不断进行, 中国抗战吸引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帮助。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召开, 就是这种关注与帮助的生动体现。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召开及中国国内对大会的反应, 表明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对中国人思想变动上的影响, 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 都超过了以往。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召开以及中国国内对大会的反应, 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作了进一步动员, 扩大了中国社会各界对国际援助的认识, 唤醒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和平势力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应验了“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的判断, 对中华民族精神疆界的拓展、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二战后中外关系的变动都产生了影响。

参考文献:

- [1] 王建朗, 栾景河. 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 上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2] 胡德坤.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 [3] 米特. 中国, 被遗忘的盟友[M]. 蒋永强, 陈心心, 陈逾前, 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4.
- [4] 蒋君章. 中日战争与国际反侵略运动[M]. 北平: 独立出版社, 1938.
- [5] 郑麦逸. 国外民众怎样援助中国[M]. 上海: 青年协会书局, 1939.
- [6] 沈庆林. 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7] 熊伟民.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和平主义运动[J]. 史学月刊, 2003(12): 67-72.
- [8] 徐蓝.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欧美和平运动的发展[J]. 世界历史, 2014(1): 4-19.
- [9] 李东朗. 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N]. 光明日报, 2015-08-28(2).
- [10] 陈铭枢. 反侵略的国际和平运动大会之意义及经过[J]. 现代中国, 1938(1): 20.
- [11] 薛西尔. 国际联盟的意义[J]. 邵宗汉, 译. 世界知识, 1935(8): 423.
- [12] 朱蓉蓉. 半官方社团与战时民间外交[J]. 江苏社会科学, 2011(5): 186-192.
- [13] 钱俊瑞. 反侵略的世界和平运动与中国[J]. 世界知识, 1938(4): 124-126.
- [14] 杨晋雄. 新术语浅释: 世界和平运动大会[J]. 青年界, 1936(4): 3.
- [15] 曹树铭. 释反侵略运动[J]. 黄埔, 1938(3): 5-6.
- [16] 陈铭枢. 关于国际和平会[N]. 申报, 1938-01-17(2).
- [17] 世界和平大会已告闭幕发表宣言, 以斗士精神维护和平[N]. 大公报, 1936-09-07(4).
- [18] 谷溪. 国际反侵略会怎样援助我们? [J]. 时事月报, 1938(6): 443-447.
- [19] 胡德坤. 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08-05(8).
- [20] 国际反侵略大会开幕, 蒋委员长特电致谢忱, 中国分会宋会长电致演词[J]. 战地通信, 1938(19): 15-16.
- [21] 巨渊. 谢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J]. 动员周刊, 1938(4): 2.
- [22] 陈铭枢. 国际反侵略大会之意义及经过[J]. 闽政与公余非常时期合刊, 1938(18): 72-73.
- [23] 川省政府令各县举行反侵略大会电[J]. 四川省政府公报, 1938(107): 36.
- [24] 雷志松. 中共对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反应[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4(4): 46-50.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15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75-76.
- [26] 边区文化界大会致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电[J]. 解放, 1938(31): 23-24.
- [27] 湖北省宜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宜昌县志[M].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1993: 21.
- [28]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中共四川地方党史大事年表[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73.
- [29] 社评: 祝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N]. 大公报, 1938-02-12(2).
- [30] 社评: 感谢伦敦反侵略大会[N]. 大公报, 1938-02-15(2).
- [31] 援华反日办法[N]. 大公报, 1938-02-15(3).
- [32] 社论: 祝国际反侵略大会[N]. 新华日报, 1938-02-10(1).
- [33] 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 全国文化界响应世界反日援华大会特刊[N]. 新华日报, 1938-02-12(4).
- [34] 国际反侵略宣传周儿童日特刊[N]. 新华日报, 1938-02-13(4).
- [35] 国际反侵略大会今日在伦敦开幕[N]. 新华日报, 1938-02-11(3).
- [36] 国际反侵略大会八百余代表一致反日援华[N]. 新华日报, 1938-02-14(3).
- [37] 国际反侵略大会通过援助中国决议[N]. 新华日报, 1938-02-15(3).
- [38] 国际反侵略大会中援华抵制日货会议闭幕[N]. 新华日报, 1938-02-16(3).
- [39] 我国坚持抗战后, 国际间开展援华运动[N]. 新中华报, 1938-02-5(1).
- [40] 全国各地举行反侵略运动响应反日援华大会[N]. 新中华报, 1938-02-10(1).
- [41] 伦敦举行民众大会响应世界和平运动[N]. 新中华报, 1938-02-20(1).
- [42] 社论: 国际反侵略的力量[J]. 全民抗战, 1938(19): 1.
- [43] 社论: 国际反侵略运动[J]. 抗战三日刊, 1938(40): 2.
- [44] 张铁生. 我们应该怎样加强扩大国际反侵略运动[J]. 抗战三日刊, 1938(47): 5.
- [45] 有四十国代表出席, 援华大会今在英举行[N]. 新新闻, 1938-02-12(16).
- [46] 赵可师. 拥护国际反侵略大会[J]. 江西地方教育, 1938(106): 3-5.
- [47] 淑美. 国际反侵略大会的成果[J]. 妇女共鸣, 1938(3): 7-8.
- [48] 世界反侵略大会开幕盛况[N]. 新华日报, 1938-02-13(1).
- [49]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 反侵略运动丛书——国际反侵略运动伦敦大会各国代表演讲实录[Z]. 武汉: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 1938: 75.
- [50] 史枚. 武汉各界成立了拥护援华制日运动筹备会[J]. 全民抗战(保卫大武汉特刊), 1938(7): 26.
- [51] 全国各地举行反侵略运动, 响应反日援华大会[N]. 新中华报, 1938-02-10(1).
- [52] 今日下午三时在市商会, 武汉各界举行响应国际反日大会[N]. 新华日报, 1938-02-11(3).
- [53] 罗玉明. 湖南抗日救亡运动史料[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424.
- [54] 沙东迅. 广东抗日战争纪事[M].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4: 128.
- [55] 延市妇孺反对侵略者[N]. 新中华报, 1938-02-20(2).
- [56] 国际反侵大会在伦敦开会[J]. 时事半月刊, 1938(9): 38-41.
- [57] 蔡元培.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歌[J]. 江西地方教育, 1938(169): 37.
- [58] 茅盾. 我们怎样回答朋友们的热心[N]. 大公报, 1938-02-12(2).

- [59] 社评: 怎样开展国际援华运动[N]. 申报, 1938-12-26(2).
- [60] 于葦. 援助中国的世界反侵略运动[M]. 武汉: 生活书店, 1938: 54.
- [61] 吴亮夫. 不要忽视了国际反侵略大会[J]. 创导半月刊, 1938(8): 6.
- [62] 张志让.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与中国抗战[J]. 全民周刊, 1938(9): 134-135.
- [63] 郭沫若. 国际形势与抗战前途[M]. 武汉: 自强出版社, 1938: 71.
- [64] 冯玉祥. 抗战时歌选[M]. 桂林: 三户图书印刷社, 1938: 183-184.
- [65] 之东. 只有坚决的抗战才能争取国际的同情[J]. 浙江潮, 1938(11): 200-201.

Domestic reaction towards the World Conference for the Boycott of Japan and Aid to China during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LEI Zhisong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World Conference for the Boycott of Japan and Aid to China was held by I.P.C. in London in February 1938. This conference severely condemned the crimes of Japan, and decided to punish Japan and aid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he conference, both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tended high expectations, domestic press paid constant attention, and non-governmental groups and various circles of the society gave warm responses. The conference laid important foundations for China's anti-aggression cause and fight against fascism, expanded the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awakened the support for China's resistanc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forces, and affect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fter World War II.

Key Words: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P.C.; the World Conference for the Boycott of Japan and Aid to China; public opinion

[编辑: 苏慧]